

目 次

引 言	1
一 经和经学	6
(一) 孔子与“六经”	7
(二) 从“六经”到“十三经”	10
二 经学的流传	32
三 经学的派别	36
四 经学的盛衰	47
(一) 汉代经学——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争	47
(二) 魏晋经学——郑(玄)学与王(肃)学之争	68
(三) 唐代经学——经学的统一	76
(四) 宋学——经学的变古派	84
(五) 明代经学——经学的衰落	110
(六) 清代经学——经学的复兴	123
五 经书的注释	154
后 记	166

引 言

还没有哪一门学科象经学那样对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思想、文化学术和社会意识的影响那样深远。从汉武帝“废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之后，孔子和《六经》几乎成为神圣不可触犯的圣人和经典，儒家思想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。在西汉，统治者提倡儒学，通经可以为仕，朝廷诏令及群臣奏议皆援引经义以为依据，甚至还有所谓以《禹贡》治河，①以《洪范》察变，②以《春秋》决狱，③以三百五篇当谏书。④这在今天看来虽未免愚妄，但说明了当时经学与社会政治生活的密切关系。从汉代开始，学校、教育以及统治者的科举考试、选拔人材，几乎都以经学为重要标准和基本内容，儒学成为封建统治者维护封建统治的精神支柱，儒家思想成为封建社会精神生活和道德观念的基本准则。从文化学术方面看，经学与中国的史学、哲学、语言文字学、文献学、考据学都有密切的关系。周予同先生在皮锡瑞《经学历史》序中指出：“因经今文学的产生而后中国的社会哲学、政治哲学以明，因经古文学的产生而后中国的文字学、考古学以立，因宋学的产生而后中国的形而上学、伦理学以成”，这就概

括地说明了经学与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思想和文化学术的密切关系。

过去一些经学家宣扬“六经治世”，“六经致用”，“六经是万世教科书”，那当然是迂腐和荒谬的；但是，如果我们要研究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思想史，研究中国的文化学术史，研究儒学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，那么，了解经学，用马列主义的立场、观点、方法来研究和总结经学的历史发展就是必要的了。

中国经学，从慎重一点说，追溯到西汉初年为止，也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。在这两千多年中，经部书籍，就其量来说，真可谓“汗牛充栋”。我们只要看一看纳兰性德汇刊的《通志堂经解》、阮元汇刊的《清经解》、王先谦汇刊的《续清经解》，就使人目眩；至于朱彝尊《经义考》所列举的书目，那就更数不胜数了。据《四库全书总目》的著录，经部书籍已达一千七百七十三部，两万零四百二十七卷。^⑤ 经学的历史如此之长，经学书籍如此之多，但直到现在还没有一部严整的、系统的经学通史。过去关于这方面的论著，主要有皮锡瑞的《经学历史》，刘师培的《经学教科书》。除此之外，与经学有关，对经学研究有历史、资料价值的著作也还有一些，这方面的著作大致可分为三类：

(1) 以经师为中心的，如胡秉虔的《西京博士考》、张金吾的《两汉五经博士考》、王国维的《汉魏博士考》、江藩的《国朝汉学师承记》以及各史书的“儒林

传”或“儒学传”等；但这类著作多为断代记载，不能看出经学发展的趋势，且偏重于个人成就。而看不出某一时期总的情况。（2）以书籍为中心的，如朱彝尊的《经义考》、翁方纲的《经义考补正》、郑樵的《通志·艺文略》、马端临的《文献通考·经籍考》、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的“经部”以及各史的“艺文志”或“经籍志”等；这类著作虽不限于断代，但仍不能从中看出经学发展的总趋势。（3）以典章制度为中心的，如顾炎武的《石经考》、万斯同的《石经考》、杭世骏的《石经考异》等都属这一类。在古代，选举、学校同经学有密切的关系，所以《通典》的“选举门”、《通志》的“选举略”、《文献通考》的“选举考”和“学校考”也属于这一类。但这一类著作往往是罗列若干史料，加以排比，而不能显示出典章制度在经学上的前因后果和彼此相互关系。总之，以上三类书籍只能作为辅助的或分门的研究参考资料，要想全面了解经学的历史发展，仍有待于经学通史。然而，在经学历史如此长久，经学书籍如此众多的情况下，要撰写经学历史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，也绝不是笔者的学力所能胜任的。这本《经学概说》只不过是依据前人的研究成果，参考前人有关经学方面的著作，对中国经学的情况，作一个简要的介绍和叙述，提供一些经学方面的基本知识，主要是“述”，斟酌之处，不外乎是取舍之间而已。如“述”得不够准确、不够全面或者有错误，就恳请专家和读者指正。

注 释

①《汉书·平当传》：“当以经明《禹贡》，使行河，为骑都尉，领河堤。”颜师古注：“《尚书·禹贡》载禹治水次第，山川高下，当明此经，故使行河也。”河，指黄河。

②《汉书·夏侯胜传》：“会昭帝崩，昌邑王嗣立，数出。胜当乘舆前谏曰：‘天久阴而不雨，臣下有谋上者，陛下出，欲何之？’……是时光（霍光）与车骑将军张安世谋，欲废昌邑王。光让安世，以为世语。安世实不言，乃召问胜。胜对言在《洪范传》，曰：‘皇之不极，厥罚常阴，时则下人有伐上者，恶察察言。’故曰臣下有谋。光、安世大惊，以此益重经术士。”

③《汉书·艺文志》六艺略《春秋》家著录《公羊董仲舒治狱》十六篇，王先谦《补注》：“胶西董仲舒老病致仕，朝廷每有政议，数遣廷尉张汤亲至陋巷问得失，于是作《春秋决狱》二百三十二事。”（董氏此书今佚）

④《汉书·儒林传》：“（王）式为昌邑王师。昭帝崩，昌邑王嗣立，以行淫乱废。昌邑群臣皆下狱诛……式系狱当死，治事使者责问曰：‘师何以亡谏书？’式对曰：‘臣以《诗》三百五篇朝夕授王，至于忠臣孝子之篇，未尝不为王反复诵之也；至于危亡失道之君，未尝不流涕为王深陈之也。臣以三百五篇谏，是以亡谏书。’使者以闻，亦得减死论。”

⑤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：“《易》类一百五十八部，一千七百五十七卷；附录八部，十二卷。《易》类存目三百十七部，二千三百七十一卷（内四十六部无卷数）；附录一部，一卷。《书》类五十六部，六百五十一卷；附录二部，十一卷。《书》类存目七十八部，四百三十卷（内十部无卷数）；附录一部，

四卷。《诗》类六十二部，九百四十一卷，附录一部，十卷。《诗》类存目八十四部，九百一十三卷（内八部无卷数）。《礼》类《周礼》之属廿二部，四百五十三卷，《仪礼》之属廿二部，三百四十四卷；附录二部，一百廿七卷；《礼记》之属二十部，五百九十四卷；附录二部，十七卷；《三礼》总义之属六部，卅五卷；通礼之属四部，五百六十三卷；杂礼书之属五部，卅三卷。《礼》类存目《周礼》之属卅七部，二百七十七卷（内三部无卷数）；附录二部，廿四卷；《仪礼》之属九部，一百五卷；附录四部，廿二卷；《礼记》之属四十一部，五百五十四卷（内一部无卷数）；附录四部，七卷；《三礼》总义之属二十部，三百一十卷（内一部无卷数）；通礼之属六部，二百四十七卷；杂礼书之属十七部，八十七卷（内三部无卷数）。《春秋》类一百十四部，一千八百三十八卷，附录一部，十七卷。《春秋》类存目一百十八部，一千五百七十六卷（内十部无卷数）。《孝经》类十一部，十七卷。《孝经》类存目十八部，五十三卷。《五经》总义类卅一部，六百七十五卷；附录一部，卅六卷。《五经》总义类存目四十三部，三百四十九卷（内七部无卷数）。《四书》类六十二部，七百廿九卷。《四书》类存目一百一部，一千三百四十一卷（内十四部无卷数）。《乐》类廿二部，四百八十三卷。《乐》类存目四十二部，二百九十一卷（内四部无卷数）。小学类训诂之属一十二部，一百廿二卷；字书之属卅六部，四百八十卷；韵书之属卅三部，三百十三卷。小学类存目训诂之属八部，六十四卷；字书之属六十八部，六百六卷（内二部无卷数）；韵书之属六十一部，五百三十七卷（内七部无卷数）。”总计一千七百七十三部，二万零四百廿七卷。

一 经 和 经 学

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，作为封建专制统治法定的经典，是以十三经为代表的儒家典籍；作为中国封建文化主体的，是儒家经学。

“经”字最早见于周代铜器铭文，其意义是“经维”，也就是“经营”的意思，最初字形亦作“𦉰”。“经”作为典籍解释，到战国之后才出现，而且那时指称“经”的并不限于儒家典籍。①把儒家书籍说为“经”的，开始见于《庄子·天运篇》：“孔子谓老聃曰：‘丘治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六经，自以为久矣。’”从此之后，“经”就往往用来专指儒家经典。然而，被称为“经”的那些儒家典籍为什么叫“经”？历来有各种不同的说法。班固的《白虎通义》释“经”为“常”，即常道，也就是永恒不可改变的道理。皮锡瑞在《经学历史》中说：“或当删定六经之时，以其道可常行，正名为经。”孔广森说：“北方戎马，不能屏视月之儒；南国浮屠，不能改经天之义。”②所谓“经天之义”，是说六经大义如日之经天，所以叫“经”。《说文解字》：“经，织也。”段注：“织之从丝谓之经，必先有经而后有纬，是故三纲五常六艺谓之天地之常经。”这些说法，都未免穿凿附会，而且把儒家经典神圣化了。所以范文澜先生说：

“为什么叫经，是无法说清楚的。”③

经学盛行于汉代，而且汉代以经学治国。因此，所谓经学，就当日言之，多少含有“经世之学”的意味；但就我们今天的理解而言，所谓“经学”，就是指解释、阐述和研究儒家经典的那套学术。这门学术，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。这两千多年的经学，就其阐释和议论的不同形式来看，是学术流派问题；就其阐释和议论的实质来看，又代表不同阶级（阶层）的利益。前者体现了经学的学术继承性，后者则体现经学的阶级性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经学基本上是适应封建统治阶级的需要而随着社会、经济、政治情况的发展而产生的精神武器，它内部各流派的斗争，则是历代地主阶级内部各阶层展开思想斗争的一种形式。

中国封建社会造就的以经学为核心的封建意识形态，一直占据着正统地位，对巩固和延续封建制度，起了巨大作用；对抑制新思想的萌芽，阻滞科学的发展也起了很大的作用。

（一）孔子与“六经”

儒家经书，最初只有“六经”（也叫“六艺”），即《诗经》、《书经》、《礼经》、《乐经》、《易经》和《春秋》。《乐经》今不传，古文经学家以为古实有《乐经》，因秦毁而亡；今文经学家则认为古无《乐经》，乐包括在诗

与礼之中，实只有“五经”。

史称孔子删定六经。但是，孔子与“六经”的关系究竟如何，实在是一个不容易说清楚的复杂问题。

《礼记·经解》说：“孔子曰：入其国，其教可知也：其为人也，温柔敦厚，《诗》教也；疏通知远，《书》教也；广博易良，《乐》教也；洁净精微，《易》教也；恭俭庄敬，《礼》教也；属辞比事，《春秋》教也。”这样说来，则孔子始以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为六经。但《礼记》篇名虽为“经解”，而孔子所说的话中却无“经”字。《庄子·天运篇》说：“孔子谓老聃曰：丘治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六经。”按照这种说法，则孔子始明言“经”。西汉的经学家以及以后的今文学派认为六经皆孔子手定，有孔子然后有六经，孔子之前无所谓“经”，他们认为孔子删定六经是经学的开辟时代。他们认为孔子作六经，或用以教人，或寄托其改制主张，或借以谈论哲理，因而认为孔子是政治家、教育家、哲学家。今文学派的这种说法未免有点迂阔，他们不明白“经”未必是孔子所作，而且“经”名之起，据目前所知文献记载，大概起于《墨经》，而不起于孔子。④

古文经学家则认为：孔子自己承认他是“述而不作，信而好古”，他只不过是把前代已有的史料加以整理传之后人，以保存古代文化而已，因而认为孔子是继往开来的史学家。以六经而论，《易》自周公作爻辞，

方成为经，孔子所作只是《易》传；《礼》、《乐》皆周公所定，尤以《周礼》是周公致太平之书，与孔子无关；《春秋》孔子亦据周公旧例修之；《书》、《诗》皆成于孔子之前。古文学家们认为六经皆周公旧典，所以他们崇奉的是周公，而不是孔子。

在现代的学者中，对孔子与六经的关系，说法亦不尽相同。现将范文澜先生的意见和杨伯峻先生的意见引述如下：

范文澜先生说：“孔子是贵族出身，又作过鲁司寇，有条件收集各种文献材料。他又是第一个创设私立学校的人。他的弟子前后共三千人，通经者七十二人。孔子教学生的课本，就是从他收集的各种文献材料中整理出来的。从卜官那里的材料整理出《易经》，从史官那里的材料中整理出《春秋》，《乐》、《诗》、《仪礼》等书，也都是从已有的材料中整理出来的。”^⑤

杨伯峻先生说：“孔子自己说他研究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六经（《庄子·天运篇》）。从《论语》看，他经常谈《诗》。《诗》就是今天的《诗经》，是古代的诗歌总集，有庙堂之诗，有卿大夫的诗，有民歌。时代从西周到春秋中叶。孔子曾经整理过《诗》，见《论语·子罕篇》。《书》是《尚书》，又称《书经》，是古代历史资料汇编，孔子曾引用它，见《论语·为政篇》。《礼》，当孔子时或许有书，但现今流传的《礼》，即《仪礼》，则出自孔子的讲授。《乐》只是曲谱，早已

亡佚，但孔子不仅是音乐爱好者，很可能十分内行。《易》，也叫《周易》或《易经》，当孔子时，只有《卦辞》《爻辞》作占筮用，孔子曾经引用它。《春秋》是鲁国史书，孔子曾经采它作近代史和当代史的教本。孔子整理和传授古代文献的情形大概如此。”⑥

孔子在中国历史上有他的崇高地位。他是开创中国私人讲学的第一个人，也是传播古代文化的第一个人，中国古代文化的流传以至后来的扩大和发展，不能不归功于孔子。

（二）从“六经”到“十三经”

汉代的“五经”和“七经”

西汉通行今文经。六经中的《乐经》已不存在，只有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五经，所以汉武帝时只立五经博士。汉代提倡“以孝治天下”，所以到了东汉，五经之外，又增加了《孝经》和《论语》，合为“七经”。

唐代的“九经”和“十二经”

唐代以《易》、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仪礼》、《周礼》、《礼记》、《左传》、《公羊传》、《谷梁传》合称为“九经”，并以“九经”取士。“九经”之中，又依据经文字数的多少分

为大、中、小三等。《左传》、《礼记》为大经，《毛诗》、《周礼》、《仪礼》为中经，《周易》、《尚书》、《公羊》、《谷梁》为小经。在大经中，《左传》字数多于《礼记》，所以参加科举考试的人多习《礼记》，不习《左传》；在中、小经中，《周礼》、《仪礼》、《公羊》、《谷梁》难于《易》、《书》、《诗》，故多习《易》、《书》、《诗》，不习《周礼》、《仪礼》、《公羊》、《谷梁》。当时任国子祭酒的杨旂奏言：“今明经习《左氏》者十无二三……又《周礼》《仪礼》《公羊》《谷梁》殆将绝废……请量加优奖。”⑦

据宋人晁公武《郡斋读书志》说，唐文宗太和年间，复刻“十二经，立石国学”。这十二经是：《易经》、《书经》、《诗经》、《周礼》、《仪礼》、《礼记》、《左传》、《公羊传》、《谷梁传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孝经》、《尔雅》。

宋代的“十三经”

宋代的理学家把《孟子》的地位抬高，朱熹取《礼记》中的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两篇与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相配，称为《四书》，自己“集注”，于是《孟子》进入了“经”的行列。唐代的“十二经”加上《孟子》，就成了“十三经”。

现在通行的《十三经注疏》，其注疏者如下：

《周易》：魏王弼、韩康伯注，唐孔颖达等正义；

《尚书》：旧题汉孔安国传，唐孔颖达等正义；

《诗经》：汉毛亨传，汉郑玄笺，唐孔颖达等正义；

《周礼》：汉郑玄注，唐贾公彦疏；

《仪礼》：汉郑玄注，唐贾公彦疏；

《礼记》：汉郑玄注，唐孔颖达等正义；

《左传》：晋杜预注，唐孔颖达等正义；

《公羊传》：汉何休注，唐徐彦疏；

《谷梁传》：晋范宁注，唐杨士勋疏；

《论语》：魏何晏集解，宋邢昺疏；

《孝经》：唐玄宗注，宋邢昺疏；

《尔雅》：晋郭璞注，宋邢昺疏；

《孟子》：汉赵岐注，宋孙奭疏。

《易经》

《易经》又名《周易》，本是占筮书，后来被列为儒家经典，成为一部讲哲理的书。汉代以《易》为六经之首，《汉书·艺文志》称《易》为“六艺之原”。

《易经》最基本的符号是“阴”、“阳”，“--”是阳，“—”是阴。由这两个符号连成三叠而成八卦：乾☰ 坤☷ 震☳ 巽☴ 坎☵ 离☲ 艮☶ 兑☱。按《易传》说法，八卦分阴阳两类。乾、震、坎、艮为阳卦，坤、巽、离、兑为阴卦。乾是三阳爻组成，为纯阳之卦；坤是三阴爻组成，为纯阴之卦；震、坎、艮三卦皆一阳爻两阴爻组成，而其爻画皆为五、为奇数，亦为阳卦；巽、离、兑三卦皆一阴爻两阳爻组成，而其爻画皆为四，为偶数，故此三卦亦为阴卦。八卦相重，又构成六十四卦：乾、坤、屯、蒙、需、讼、师、比、小畜、履、泰、否、同人、大有、谦、豫、随、蛊、

临、观、噬嗑、贲、剥、复、无妄、大畜、颐、大过、坎、离、咸、恒、遯、大壮、晋、明夷、家人、睽、蹇、解、损、益、夬、姤、萃、升、困、井、革、鼎、震、艮、渐、归妹、丰、旅、巽、兑、涣、节、中孚、小过、既济、未济。

古称八卦为经卦，六十四卦为别卦。

六十四卦每卦六爻。从下往上数，第一爻叫“初”爻，第二、三、四、五爻仍用原名，最上一爻叫“上”爻。那一爻若为阳爻“—”，便叫“九”；若为阴爻“--”，便叫“六”。“初”爻叫“初九”或“初六”，最上一爻叫“上九”或“上六”，其余的是“九二”或“六二”，“九三”或“六三”，“九四”或“六四”，“九五”或“六五”。

六十四卦每卦有卦辞（如乾卦的卦辞是“元亨利贞”），每爻有爻辞（如乾卦下之“初九，潜龙勿用”）。卦辞、爻辞合起来就是《易经》的经文。许多研究《易经》的人都认为卦辞、爻辞是西周初年的作品，因为它所记的内容有殷商祖先的故事，也有周初的史实，却无夹杂后代的任何色彩。

除卦辞、爻辞之外，还有彖传、象传、文言、系辞、说卦、序卦、杂卦，是为《易传》，合称为“十翼”，是解释《易经》的。“十翼”相传为孔子所作，恐不可信。现在一般认为“十翼”不成于一人之手，也不是一时所作。略述于后：

彖传：随经分上下两篇，共六十四条，释六十四

卦之卦名、卦义及卦辞(如乾卦下之“彖曰：大哉乾元，万物资始……”一段)，未释爻辞。《彖传》写作年代最早，可能成于战国初甚至更早。

象传：随经分为上下两篇，共四百五十条。释卦者为“大象”，释爻者为“小象”(如乾卦下之“象曰：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”，此谓之大象；“潜龙勿用，阳在下也”为释爻之“初九”，谓之“小象”)。《象传》可能是战国中期或晚期的作品。

文言：是乾坤两卦的解说，只有两章，解乾卦之卦辞与爻辞者称为“乾文言”(如乾卦下之“文言曰：元者，善之长也……”一段)；解坤卦之卦辞与爻辞者，称为“坤文言”。《文言》曾抄录《左传·襄公九年》鲁穆姜解释《随·卦辞》“元亨利贞”四个字，自然作于《左传》流行之后，最早也不过是战国晚期的作品。

系辞：是《易经》的通论，分上下两篇，以论述《易经》之义蕴和功用为主，亦谈及《易经》筮法、八卦起源等等，并选释《易经》爻辞十九条。它的写作年代至迟当为战国晚期。

说卦：主要记述乾、坤、震、巽、坎、离、艮、兑八经卦之卦象。八卦的原始卦象是：乾为天，坤为地，震为雷，巽为风，坎为水，离为火，艮为山，兑为泽。《说卦》又依据八卦的原始卦象加以引申，如乾卦卦象是“乾为天”，由此又引申出乾为朝廷、乾为君、乾为君子(才德刚健之人)、乾为阳气、乾为刚健、乾为衣、

乾为金之类。

序卦：解说《易经》六十四卦的顺序。

杂卦：解说六十四卦之卦义，不依《易经》六十四卦之顺序，错杂而述之，故曰“杂卦”。

《说卦》、《序卦》、《杂卦》写作时代更晚，可能成于汉初，甚至更晚。

《易》学有两派：一派重象数，卜筮灾异，如汉代的《易》学；一派重义理，并附以老庄之学，如三国时王弼的《易》学。

《书经》

《书经》又名《尚书》，是我国最古的一部史书，它大体上是相当于奴隶制时代的一部历史文献汇编。

《尚书》有所谓今文《尚书》和古文《尚书》。今文《尚书》为汉初山东伏生所传，共廿八篇：

《虞书》、《夏书》：

《尧典》、《皋陶谟》、《禹贡》、《甘誓》

《商书》：

《汤誓》、《盘庚》、《高宗彤日》、

《西伯戡黎》、《微子》

《周书》：

《牧誓》、《洪范》、《金縢》、《大诰》、

《康诰》、《酒诰》、《梓材》、《召诰》、

《洛诰》、《多士》、《无逸》、《君奭》、

《多方》、《立政》、《顾命》、《吕刑》、

《文侯之命》、《费誓》、《秦誓》

伏生用这廿八篇在齐鲁之间传授，逐渐形成西汉《尚书》学三家：欧阳《尚书》、大夏侯《尚书》、小夏侯《尚书》。从汉武帝到汉宣帝，《尚书》都先后列于学官，所教的是伏生所传的廿八篇，后来又加上武帝时民间所献的《秦誓》，共为廿九篇（欧阳氏又把《盘庚》分为三篇，共三十一篇）。

汉代又出现所谓古文《尚书》。从西汉中期以后相传出现过好几次。但是这些古文《尚书》的真实情况如何，今天却难于查考。

司马氏逃到江南建立东晋后，为了维护其封建统治，又广求经典。豫章内史梅赜献了一部古文《尚书》，计有经文五十八篇。这五十八篇，其中包括今文廿八篇，但又把它离析为三十三篇（分《尧典》后半部为《舜典》，分《皋陶谟》下半部为《益稷》，分《顾命》下半部为《康王之诰》，《盘庚》仍为三篇），又从百篇《书序》中采十八个篇题，从当时已有的一些古籍中搜集文句缀成廿二篇，又另新撰《秦誓》三篇，这就是伪古文的廿五篇，以此来凑足刘向、郑玄所说的古文五十八篇之数。全书各篇有标为“孔安国传”的注，并有一篇“孔安国序”。这部伪古文《尚书》一直被人们看成是汉代孔安国所传的古文真本，直到清代阎若璩作《尚书古文疏证》，才彻底揭穿了梅氏的伪作。